

# 关于皖南事变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汤胜利

---

---

皖南事变研究一直是抗日战争史和中共党史研究中引人关注的课题,迄今为止已经出版和发表了大量著述。但是,在以往的研究中有些史实描述仍值得商榷。笔者不揣简陋,仅就以下两个史实进行考订。

## 一 关于项英向南发展的意图

王辅一说:“有人说项英想搞‘三山计划’,并以此来证明他反对‘向北发展’。史学界遍查史料,至今也未查出‘三山计划’。原在皖南新四军军部任通信科长、后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的胡立教同志,1990年曾经指出:‘我也算是当时皖南军部的知情人之一,我就不知道项英同志有个什么‘三山主义’的计划或者说法。’”<sup>①</sup>

以上说法不确。笔者从一些文献史料中发现,项英确实有一个“三山计划”,或叫“南进政策”、“南进战略”的向南发展意图,这就是建立皖南根据地,以皖南为基地,待机(即他所说的“战争形势变化”或“事变”时)进入皖、浙、闽、赣山区打游击,开辟与八路军华北解放区相配合的南方局面。

---

① 王辅一著:《项英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514-515页。

早在1938年5月4日与5月14日毛泽东就连续致电项英，命令刚组建的新四军应执行中央东进北上的战略方针，即先向位处皖南之东的沦陷区苏南进军，后向位处江北的沦陷区苏北进军，这是当时当地新四军唯一切实可行克敌致胜的战略方针。因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国民党及其军队已成了我们的友党友军，新四军绝不能到国统区去打国民党的游击，否则就会犯破坏统一战线的“左”倾错误，导致抗战的失败。项英对中共中央的这一战略方针，一开始就存有分歧。1938年6月15日，当新四军第一支队刚到苏南敌后，第二支队正准备向敌后出动之际，项英在向毛泽东等报告部队部署情况时说：“军部及三支队位置于南陵至泾县间山地，整训队伍，以大力争取这一带群众准备以太平（不含）与泾县、青阳、南陵之间山地为根据地，后方已移至这一区域内。如敌前进，即可依据这一地区在敌侧翼活动，并在某种情况下，即可派一部队到到天目山脉与仙霞山脉发展游击战争。”<sup>①</sup>这便是项英南进战略的最初轮廓，项英在这里首次主张新四军应向位处苏南之南的天目与仙霞山脉前进。

1938年6月23日，项英在给刚到苏南茅山地区的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的复信中，对此又进一步作了阐述：“我们计划在皖南要建立一个根据地，这在战略上非常重要。将来在战争形势变化时，我们可依靠这一支点向皖南各县发展，以及利用机会争取天目山脉和仙霞山脉，故部队不宜全部出动。目前除你及二支队主力出动，其余暂留此地帮助建立根据地，以备将来成为发展的基本力量。”<sup>②</sup>为了实现其南进主张，项英不顾陈毅等人反对，竟将已东行进入苏南敌后的新四军两个团调回皖南，并将中央下派和从部队上调轮训的干部统统留在军部。

①② 徐君华：《评项英的南进战略》，《大江南北》1988年第4期。

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否决了项英的南进意图,重申新四军东进北上的战略方针。1939元月,为贯彻中共中央东进北上战略方针,新四军挺进纵队管文蔚部,毅然解放了长江中的岛屿扬中,为新四军向北发展控制了桥头阵地。项英不以为然,指责了管文蔚,并命其撤出扬中。<sup>①</sup>2月,周恩来亲赴云岭新四军军部,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重申了中共中央东进北上的战略方针,当面否定了项英南进主张。5月,为贯彻中央东进北上战略方针,叶飞亲率新四军六团东进淞沪,项英坚决阻止,幸得陈毅抵制,才得东进。<sup>②</sup>

1940年元月,中原局书记刘少奇致电中央与项英,要求皖南新四军向江北发展,得到中共中央的支持,却遭到项英拒绝,他表示:“皖南部队在任何情况下,非独立行动,坚持南方不可。”<sup>③</sup>项英为实现其南进意图,不仅从苏南沦陷区调回两团主力至皖南,将大批干部屯留在军部,而且于4月7次致电中央,要求把新四军江北部队南调江南。他的要求均被中央拒绝。<sup>④</sup>

5月4日,中共中央给项英下达《五四指示》,强调新四军“无论如何不能南下”,只能“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向北发展,并电令项英传达这个指示。项英拒绝传达,于12日回电中央政治局:“四日指示今日收到……在某个问题我有不同的意见……因此中央责成我传达,不能负此责……故请袁传达。”<sup>⑤</sup>7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正副总指挥陈毅、粟裕致电项英:“皖南部队企图于友方进攻时,长

① 童志强:《项英同志在皖南的错误不可低估》,《大江南北》1988年第1期。

② 叶飞:《征战纪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70页。

③ 童志强:《项英同志在皖南的错误不可低估》,《大江南北》1988年第1期。

④ 童志强:《项英同志在皖南的错误不可低估》,《大江南北》1988年第1期。

⑤ 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67、68页。

征闽、浙,这个企图不到万不得已时,不可轻试,这是下下策。”<sup>①</sup>

10月8日,毛泽东致电项英,严肃指出:“向南深入黄山山脉游击,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均是最不利的。”<sup>②</sup>12日,毛泽东根据当时

国共摩擦日益紧迫的形势,再次致电项英指出:“因蒋是站在反日立场上,故我不能在南方国民党地区进行任何游击战争。曾生部队失败就是证明。因此,军队应乘此速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sup>③</sup>12月26日,毛泽东致电项英表示了不满:“在困难面前屡次向中央请示方针,但中央远在一年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sup>④</sup>

1941年5月,刘少奇在华中高干会议上总结皖南事变教训时说:“六中全会的时候,中央指示皖南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后来周恩来同志到皖南,也是确定了这个方针,但他们不赞成。另外有一个南进方针,黄山、天目山计划……”<sup>⑤</sup>刘少奇又说:“项英一贯坚持一个左倾的东西,就是他坚持在皖南打游击,他不懂得在目前抗战时期,在国民党后方打游击的不可能。”“项袁有个南进政策,往国民党后方钻,打国民党的游击,这完全是‘左’的,他企图把四、五支队调回皖南,做什么?准备跟国民党大摩擦,准备不要统一战线。”<sup>⑥</sup>

陈毅1941年5月17日在盐城新四军高干会议上指出:“项英对形势估计不对,坚持南进政策,坚持黄山计划、天目山计划、浙西计划。”<sup>⑦</sup>陈毅在1943年批评项英“毫无根据提出天目山计划、浙

① 志平:《再论皖南事变时期的项英》《大江南北》1991年第1期。

② 中央档案档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63页。

③ 中央档案档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64-65页。

④ 中央档案档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20页。

⑤ 徐君华:前引文,《大江南北》1988年第4期。

⑥ 童志强主编:《皖南事变研究与争鸣》,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70页。

⑦ 童志强主编:《皖南事变研究与争鸣》,第370页。

江计划、黄山计划,又如提出所谓具有中国伟大战略的坚持江南计划,企图与华北、华中鼎足而三”。<sup>①</sup>

原新四军军部干部赖少其说:“其实,中央也知道项英很难改变他的所谓南进计划,因此决定刘少奇任新四军政委,叶挺到江北任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总指挥,项英调延安学习。当时叫‘整风’,在延安‘整’项英头脑中顽固存在的‘南进’之‘风’,这是项英所不能‘屈服’的。”<sup>②</sup>

原新四军军部干部汪海粟说:“项英是有南进的打算的……陈毅最了解他,说他是‘守株待兔’。中央也讲过他‘株守皖南’。项英为了守皖南之株,待日寇打通浙赣线之兔,曾经把老一团从江南调回,也曾要求把四、五支队南调,陈毅向他要干部,他一个也不舍得给。项英坚持他的主张,原因是多方面的,至少有三条:一、他害怕到平原和河网地区流动作战,到江南或苏北,不及山区驾轻就熟,不及皖南安逸。二、中央‘五四指示’要求独立自主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的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并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项英对中央这个专给新四军的指示,简直不敢设想,不能接受。中央指示皖南由项英传达,他置之不理,交给袁国平传达,一交了之。三、项自视甚高,在皖南大小会议上,很少提到中央,从来不提毛泽东。他是想,一旦日寇打通浙赣线,黄山、天目山沦为敌后,仙霞岭、四明山也处于沦陷区,皖南部队就可以南下

① 志平:前引文,《大江南北》1991年第1期。

② 童志强主编:《皖南事变研究与争鸣》,第371页。

打开一个大局面。那时候你老毛就无话可说了。”<sup>①</sup>

以上虽为口碑,却众口一辞,故不能否认项英确实曾有过南进意图。皖南事变前项英不愿把更多的部队与干部派往敌后,导致军部及直属三支队迟迟不能东进北上,长期滞留皖南一隅,与他的这南进意图不无关系。

## 二 皖南新四军的转移路线及中央复电

皖南新四军有三条转移路线:一为北线,就地从铜陵、繁昌北渡长江;二为东线,东经皖南宣城、郎溪等县,到达苏南溧阳等地,待机北渡;三为南线,从军部所在地云岭出发,向南绕道茂林、宁国至苏南,待机北渡。

杨奎松认为:1940年12月“28日新四军军分会开会时,仍旧做出了基本依照蒋令走北线,即大部队直接渡江去皖东北的决定”。<sup>②</sup>而笔者从史料中了解,28日军分会并未做出走北线的决定,而是做出了走南线的决定。新四军军部秘书长李一氓在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后,于1941年3月20日给中央书记处写了一个报告。报告说:“我军行动路线:一、三战区原来指定的到苏南的路线,我军必须通过国民党五十二师和一〇八师的防地,那时候两师的兵力及苏南国民党六十二师冷欣部已分别集中,在我军经过的地区已筑好工事;二、稍偏点走国民党五十二师及一〇八师的背后,但仍须打两师;三、再南走泾县、宁国以南、旌德以北,脱离五十二师及一〇八师,但与四十师有遭遇的可能,我们只打四十师估计力量有余;四、故决定

① 童志强主编:《皖南事变研究与争鸣》,第373-374页。

② 杨奎松:《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载《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

走这条路线。”<sup>①</sup>李一氓所指的“这条路线”，就是指绕道茂林的南线。李一氓曾参加28日军分会，了解会议的决策经过，而这份报告距军分会不到3个月，因此他的回忆应是准确的。俞申指出：“据当时军部作战科长李志高说，28日晚，军部副参谋长周子昆到参谋处布置部队北移改走南线，经茂林、宁国到苏南的决定，大家都感到突然。李单独向周提出走南线欠妥，且准备不及。周子昆犹豫了一下说：‘军分会讨论是有分歧，不过三溪、宁国之间有一大块空档，有些顽固派地方武装，问题不大。已决定了，照办吧……’并说这也是同三战区商量过的路线，是合法的。”<sup>②</sup>李志高是新四军军部参谋部作战科科长，他的回忆旁证了李一氓的说法。

杨奎松断定28日军分会做出北渡决定，并提出：“对此，毛泽东在次日的复电中更是表示同意。电称（一）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一部分资材经苏南。（二）头几批可派得力干部率领，希夷（即叶挺——引者注）可随中间几批渡江，项英行动中央另有指示。”<sup>③</sup>这份电报源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24页。而笔者认为，这份电报应该是毛泽东在11月29日，而不是12月29日打给项英的。

由于原电均为韵目代日，地支计时，不写年月，月份为后人所加，故月份极易判错。如果这份电报是12月29日发出的话，那么从内容看，似乎皖南军部直到12月底还没有将部分资材转移苏南。而事实上从12月1日起皖南军部就开始有机关后勤人员和部分资材经苏南向苏北转移了。对此，项英于12月4日已报告中央军委：“向苏南兵站线已开始恢复，工作人员及资材已于一日起

① 陈枫编著：《皖南事变本末》，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7页。

② 童志祥主编：《皖南事变研究与争鸣》，第321-322页。

③ 杨奎松：《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

分批移动,战斗部队则等候情况与时机移动。”<sup>①</sup>如果认定中央这个指示是在11月29日发出的,那么对皖南军部从12月1日起分批移动人员与资材就不难理解了。再有,中央既然表示“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一部分资材经苏南”,则说明在此之前皖南军部先有关于部队和资材转移向中央的请示报告。只要查到皖南军部给中央的请示报告的发出时间,就可弄清中央复示的时间。经查,这份馆藏于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原件上两条指示前有“感酉电悉”4个字。“感酉”即27日17点到19点之间。“感酉电悉”说明中央的29日指示是对项英27日傍晚发给中央电报的答复。再深入一查,果然发现11月27日项英确有为请示关于部队和资材转移问题给中央的电报。电报提出:皖南部队“由苏南北移路线途中困难多,危险性较大,反不如由三支地区兼程北移皖北较有利(仅有一道封锁与长江),既时间经济又直接增援皖东”,因此,决心将大批工作人员和部分资材“先经苏南至苏北”,“再以突击方式将部队由现地区突过长江至皖北”。电报还就“希夷与项英是否同行或分途北进”请求中央“从速连同以上意见一并电示为盼”。<sup>②</sup>中央回复电报中的两条指示正是对这一请示的具体回答。项按照中央11月29日复电,即于12月1日开始向苏南移动工作人员和资材。根据以上分析,可以断定这份电报是在11月29日发出的,而不是12月29日发出的。

(作者汤胜利,中共安徽省铜陵市委党校副教授)

(责任编辑:荣维木)

① 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08、127、271页。

② 中共党史出版社《皖南事变》编纂委员会编:《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69-70页。